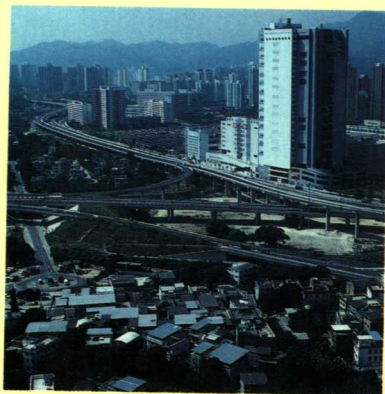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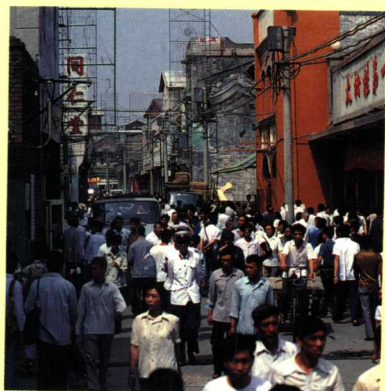


中國城市與區域發展 展望廿一世紀

楊汝萬 編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中國城市與區域發展 展望廿一世紀

楊汝萬編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中國城市與區域發展：展望廿一世紀

編者：楊汝萬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地址：香港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印刷：當代發展公司

版次：1993 年 1 月第一版

國際書號：ISBN 962-441-514-5

© 香港中文大學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前言

亞太城市與區域發展計劃，隨着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於1990年成立後，舉辦了一連串的國際性研討會，探討和分析多種區內的城市與區域發展問題。此等研討會皆具鮮明的前瞻性，對過去及目前的發展進行回顧和總結，從而對下一世紀的局面和進路作出展望和預測。

還剩不到十年的光景，我們便踏入廿一世紀，亦即常稱為的太平洋世紀。顧名思義，這意味着在下一世紀，太平洋國家將扮演比目前更重要的角色，推動世界經濟發展之巨輪，成為世界最矚目的經濟發展地區，更能配合日益深化的全球性經濟結構的轉變和互靠，產生蓬勃有力的投資環境和經濟效益。影響所及，不僅現在發展已頗可觀的日本、四小龍和東協國家繼續邁步向前，其他亞洲國家以至更廣泛的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亦會被這以亞太區為核心的經濟推動力所催化，有助它們的經濟、文化及其他方面的發展。

在這急劇蛻變的環境中，中國可貢獻的地方一定愈來愈多。自1978年以來，由於推行經濟改革和開放政策，中國成為亞太區經濟發展極其迅速的國家之一。經過十餘年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國城市和區域發展在既發揮地方的主動性，又不失全局觀點的策略下，出現了重大的轉變和進步。此外，經過幾個經濟特區的營造，十四個沿海城市和其他臨海地區相繼對外開放，形成沿海的開放地帶，更進一步改變了中國區域發展的格局。這一系列的變化對中國今後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都必然產生巨大和深遠的影響。

1991年十二月亞太城市與區域發展計劃舉辦了一個命名「中國城市與區域發展——展望廿一世紀」的研討會。與會者大部分來自中國大陸的各地區和學術單位，其他的學者則隸屬台灣與香港的大學。研討會的主要目標有二。在學術領域方面，它旨在分析和總結中國的城市與區域發展在近年開放政策下出現的重要而廣泛的轉變和進步，進而對九十年代以至廿一世紀的發展趨勢作系統性和科學化的預測和展望；另一方面，我們期望藉這研討會，促成中國內地、台灣和香港三地學者在融洽及友好的氣氛之下，作有意義的學術交流，推動三地學者尋求更有突破性的學術合作和實際發展計劃。在會議期間，與會者參加了香港城市發展的實地考察，外來學者得以親身了解和觀摩這充滿活力和日新月異的亞太都會。

研討會能夠順利舉行和本書得以完成出版，實有賴中國三地地區多個機構和個人的鼎力支持和衷誠合作。首先，研討會的構思是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高錕教授提出的。北京大學的周一星教授和台灣大學的姜蘭虹教授對整個計劃的內容和運作，貢獻許多寶貴的意見，我謹此一一致意。再者，研討會得到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多所知名大學和研究所與其學者全力協助，他們不但絕無吝嗇地對指定的課題暢然發揮，成之以文，他們所屬的單位亦提供多方面的幫助，對此，我謹表衷心的謝忱。同時，台灣學者的參與得到台灣太平洋文化基金的贊助，也謹在此鳴謝。在研討會的籌備和本書的編輯過程中，我得到研究所的同仁，特別是雷競旋、尹寶珊、鹿崇崗和汪唐鳳萍努力不懈地協助，殊深感銘。會議期間的實地考察，除了對鄧永成的領導和策劃擊節讚賞外，還須向香港房屋委員會和九廣鐵路公司的輕鐵部致意，他們的妥善安排使外來學者對香港城市發展這兩個重要環節，有親身的初步體驗。最後，為求本書更臻完善，幾乎所有的插圖都由香港中文大學地理系的杜士流重新繪

製，令全書的觀感和參考價值明顯地有所提高。

近年來，中國三地學者通過在香港舉行的研討會，在學術氣氛下互相切磋的機會漸多，也就增進了相互的了解和合作。另一方面，城市與區域研究在三地均可稱生氣勃勃，有關文獻的數量，大幅遞升，中英文均如是。當然，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改革開放政策的繼續施行，令城市和區域發展本身產生連鎖性的反應和變化，進一步刺激了學者的興趣。改革開放也大大改善了研究的環境，令有關學者嘗試進行新的學術活動，包括實地考察和有限度的調查。其次，中外和中港學者的合作研究也逐漸展開。另一有利的因素是日益豐富和廣泛的資料和數據，從整個中國以至每一省、大城市甚至更小的單元都普遍地提供這方面的材料，為研究中國城市、區域發展帶來莫大幫助。然而，三地學者對中國城市與區域發展的研究各有本身的學術傳統、經驗和分析方法，因而對同一問題往往達致迥異的結論。因此，研討會的舉行與此書的出版只標誌着我們對現今中國發展和現代化最重要的一環，邁出共同合作、交流和探索的第一步。在殊途同歸的文化背景、經濟基礎和學術智慧上，我們應齊心合力關注和深化我們對中國城市與區域發展的了解和剖析，謀求利國利民和顧及長遠計劃的發展策略，為中國創造更美好和燦爛的將來。

編者

一九九二年五月

序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城市與區域對整個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的重要性，可追溯到遠古時代，古代的文獻和近代的地誌對此已多所印證。1949年後隨着新政權的建立，城市與區域發展礙於政治因素、國際形勢和其他不利條件，長期未有合乎經濟原則和常理的發展，走了很多迂迴曲折的道路，沒有發揮應有的潛能和經濟效益，使國家長時期處於較慢的增長率，與發達國家甚至某些發展中國家的距離，日漸拉大。在亞太地區近數十年經濟迅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日益改善的同時，中國仍舊裹足不前。但在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努力後，中國已出現令人刮目相看的轉機，對以往“失去”的經濟發展機會和時光，正迎頭猛追。

自從1978年中國採納了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經濟、社會、文化以至意識形態，都經歷了被論者描述為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個變化過程中，城市與區域發展充份發揮了按照地理優勢、採取擇優棄劣、有先後次序的發展策略。最初，隨着農業的改革，鄉鎮企業崛起，攪活了小城鎮的經濟。小城鎮在沿海地區，特別是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復甦或興起，掀起了學術界研究小城鎮的一股熱潮（費，1984；王，1989；沈、張，1985；許等，1987）。學者之間熱烈地討論中國城市化的特徵和問題，比較外國經驗的異同，終於成功地說服了決策者，改變了較早時流行於他們當中的工業化不需城市化的概念，城市化的定位，因而得到肯定。中國城市化道路和前景的探索繼續成為研究焦點（葉等，1988；張等，1991）。

由於沿海城市和人口遷移對經濟發展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有關這方面的問題成為熱門的研究對象（胡、楊，1990；劉等，1990；李、胡，1991）。還有學者對城市基礎設施（郭、華，1990）、城市經濟（李等，1989）、土地經濟（華等，1991）、經濟特區（許、蔡，1990）、地區性如珠江三角洲的城市發展（中山大學地理系，1988）等，作出專門論述。總之，近年來中國大陸出版的城市與區域發展的學報和書籍，不勝枚舉，反映了大批學者和專業人士積極關注和研究城市與區域發展的問題。

可是，迄今為止，還沒有書籍嘗試將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三地的研究融匯一起來探討中國城市與區域發展的問題和特徵，從而取長補短，對理論和實際經驗，提出新見。況且，倘若同一課題同時供三地不同學者鑽研，其結果必截然不同。此書與其他專著的分別便是創新性地結合了以上兩優點，全書共分五大部，廿一章，茲綜述如下。

第一部闡述和分析中國區域發展的趨勢。四章之中有中國三地學者以不同的治學方法處理相近的課題，其結論大體都是樂觀的，各有引人入勝之處。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中國經濟建設刻意地偏重內地，沿海地區的發展被抑制，在六、七十年代更有“三線”的倚重，加強內陸的投資與發展。但1978年開始實施開放政策以來，隨着沿海地區有顯赫的經濟發展成績，國內區域之間的互靠互動關係，呈現了尖銳的矛盾。四篇論文提出一系列錯綜複雜的問題，並加以分析和預期將來的進路。它們共同關注的幾個中心構思，值得在此作出介紹。

胡序威（第1章）和陳小紅（第4章）均就改革開放對沿海地區和城市發展作深入的探討。胡序威的論文突出了中國沿海城市為國家的重要窗口和門戶，佔全國外貿總額和外資利用方面很大的比重。由於地區間和城市間的發展速度，差別很

大，一個多層次和相互競爭的格局已形成。從數據顯示，八十年代沿海經濟迅速發展不但推動了城市化，1980至1989年間，單在沿海開放地帶範圍內建市的城市便由47個增至90個。而且，大城市與小城市的經濟活動異常蓬勃，形成所謂“葫蘆形”，改變了城市格局。當前沿海城市發展的成績可稱超卓，惟多種問題存在，其中包括缺乏宏觀調控，盲目引進，重複建設和產業結構趨同的現象。雖然如此，沿海城市發展已呈區域分工與合作，力求更大的經濟效益。

中國沿海城市與區域發展，尤其是特區與開放城市的發展方向，胡序威間接指出但陳小紅強調，已把中國納入世界的國際資本主義分工體系中。這體系是在亞太區內，展開全球性經濟活動，是有關國家的發展和動力泉源，中國被納入此系統，實有助促進其經濟發展。事實上，亞太地區內現正對幾個有中國參與的跨國經濟合作團體，進行積極的構思和探討，如“東亞經濟圈”，“日本海經濟圈”，“渤海開發計劃”，“大中華經濟共同體”等（史、高，1991：《中國時報周刊》，1992）。陳小紅又認為到目前為止的改革步伐，總體經濟目標的優先性已凌駕於城市與區域發展之上，同時不均衡發展策略亦逐漸取代了均衡發展理念。從國家的發展策略看，沿海地帶的迅速發展產生了“政治”和“經濟”的矛盾，對政治控制和經濟利益須作出不能兩全其美的抉擇。

陳小紅（第4章），邵清於、曾菊新（第2章）和朱劍如、鄧永成（第3章）都不約而同提出區域發展的核心概念——均衡發展，即效率與公平兩大原則所產生的政策。邵、曾對這問題有詳盡的討論，並引用外國學者的分析方法。他們揭示了中國的“東西問題”，即在東、中、西三大地帶劃分的基礎上，出現了諸如“梯度推移”論等多種想法。對區域差別，隨着沿海地帶的急速發展，不均衡情況加劇，但如果借鏡其他

國家的經驗，這是初期發展階段的正常現象。他們鼓吹中國在九十年代以至廿一世紀，發展方針應兼顧效率與公平，國民收入地區分配逐步均衡，以確保國家的整體利益。

朱、鄧處理區域發展與經濟改革相關的問題，將最具支配性的兩項機制作為探討對象，即地域性的價值轉移（transfer of value）和收入轉移（transfer of revenues）。簡單來說，價值轉移使東部沿海地區得益，因原產品和能源等物資多從中、西部供應。收入轉移則有利於內陸和西部地區，因這些地區在生產方面長期處於虧損狀態，需要國家補貼。朱、鄧認為迄今的經濟改革和開放政策欠全面性和全盤計劃，其困難源於中央計劃和因此而必然產生的一個資源約束的短缺經濟，支持與反對改革開放的兩股力量長期對立，因而引發出多種反制度的行為。論文展示，內陸和沿海的差距在開放前後明顯地擴大了。展望將來，他們預測南北的分野愈來愈明顯，一個“雙元空間”經濟格局似乎無可避免——北部成為較封閉而中央強控的區域，而南部卻享有中央較寬鬆的控制和較為自由開放。

第二部四篇論文主要是從宏觀角度評估中國的城市發展。它們所概括的問題甚廣，諸如城市化的進程、基礎設施、控制大城市、農業勞動力的轉移等等，大多有交錯互動的關係，故可同時作簡介。文章的數據都截至1990年，甚至利用了中國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結果。

儘管中國的城市化至1990年只是26.23%（周一星，第5章），比起亞太區和其他地區仍屬偏低，但中國城鎮人口統計標準是異常複雜的，運用官方數據時必須瞭解其背景，例如如果將市鎮總人口等同城市人口，1990年中國的城市化便已達53.04%（比較周一星，第5章和陳向明，第8章）。然而，毫無疑問，在改革開放下，城市數量大幅增加。1982至1990年間，增加了228個市，超過1980年時的城市總數，充份反映

了在八十年代經濟行政體制改革帶來了一股“建市熱”。城市的誕生，可以自上而下（建新城鎮）和自下而上（鄉村升級），其中亦有行政手段所致。例如同期內二百多個縣改為市，並不反映“自然”從農業轉向非農業的城市化過程。誠然，市管縣可建立新的城鄉關係，互惠市場，打破長期的分割局面，那是另一回事，這是結果，並不是過程。隨着改革開放的實施，西部與沿海地區的城市化進度和差異，逐漸拉大，比較富裕和比較落後的城市之間，距離同時亦擴大了（見第8章）。周一星認為這是國家採取向東部地區傾斜戰略的必然結果。為求在現階段條件下能夠較快地實現高度均衡發展，這也不失為一種良策。

事實上，城市化的過程蘊藏着很多社會上的變動。其中人口流動便是一個對大城市發展極為突出的現象，它對這些大城市的社會發展、建設和管理，有利亦有弊，影響深刻而且廣泛（李、胡，1991）。至1988年，全國28個百萬人口城市中，日均流動人口高達一千三百萬，是大城市常住人口的18%，其中居住一年以上者達28.67%，流動人口的59.34%來自農村。與此現象同時出現的另一個變化是非農業經濟活動在農村的躍增，農村非農業產值在農村社會總值中的比重已由1980年的31.1%猛升到1990年的54.6%，這種新氣象與都市區和都市連綿區的新型城市空間體系的形成不無關係（見周一星，第5章）。周一星更認為現在的“離土不離鄉”的鄉鎮企業只是一種過渡形式，最終也要實現空間的轉移，“離土也離鄉”。

急劇的城市化增長容易衍生管理、財政、效率和其他問題。華奎元（第6章）針對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不足，而宗林（第7章）則正視控制大城市的經驗。兩問題之間有相通的地方。

問題的癥結源於城市的財政。大城市擴張的主要原因是它們的體制，以工業利潤和稅金維持開支，所謂“以工養城”。為着全心全意追求工業建設，直接或間接與民生質素有關的非生產性建設被置於次位。長期以來，“生產城市”的概念凌駕“消費城市”，結果是中國城市基礎設施殘缺落後，這與早期重經濟，輕服務，“見縫插針”的城市發展方針有密切關係。1979年後，訂定和推行“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政策，城市基建建樹良多。但在體制上，供需矛盾呈尖銳、公共事業成本與價格的倒掛、市政設施無償提供使用和基建資金短缺都是有待解決的瓶頸困難。中國式的“城市病”也油然而生。城市基礎設施越趨緊張，政府越想控制大城市人口規模，形成惡性循環。在這方面，中國對城市規模控制的口號，1990年已有別於十年前的了（周一星，第5章）。宗林強調控制大城市規模，應以城市的綜合效益為依歸，決不可以規模本身為標準，同時亦須因時因地而異，這才能導致城市發展有“質”的躍升，達到滿意的效果。有學者認為中國二百萬人以上城市的經濟效益最大，而今後大城市發展主要是靠改革，靠鬆綁，靠政策（葉等，1988：17，125）。

到廿一世紀開始時，中國的城市景觀將如何呢？歸納多位學者的見解，粗略的輪廓可鉤劃如下。

首先，據預測到2000年，中國農村勞動力約有五億四千萬人，其中游離出來的達三億人（沈、張，1985：75），高限的計算竟達四億人（葉等，1988：142）。這都是農業轉入非農業的龐大人口，大部分將進入城市。但是，顯而易見，城市根本沒有力量容納這一股巨大的轉化洪流，所以沈冰于、張蘇平（1985）主張大力發展和建設小城鎮，以“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進城不住城”，“亦工亦農”的形式，同步發展城鄉經濟。基於同樣倚重小城鎮的看法，劉錚等（1990：226）

預測，到2000年中國小城鎮的數量將達約15,000個，比1987年底的11,103個增加了3,897個，即平均每年增加約300個。中國小城鎮的重要性和前景，光從數字已一目了然。

另一方面，到2000年，城市人口將佔全國人口30%以上，城市人口將比1985年翻一番，即淨增約二億人（見表1）。東部地帶除廣西外，城市化水平將繼續處於全國前列。中國將有特大城市42座，合計約九千萬人，大城市69座，合計約四千萬人（宗林，第7章）。從現在到本世紀末，估計每年農村新增勞力一千萬，按最保守的推算，屆時可能有一千一百萬人進入流動人口的行列（李、胡等，1991：23）。

最後，到2000年，由於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進度參差，地區之間的生活水平差距將會拉大。經濟發達省市，如京、津、滬、粵等或某些沿海開放地區的生活水平，基本上可達日本七十年代中期水平，但邊遠或內地一些經濟後進地區的生活水平與上述地區相比，仍最少落後一、二十年（《2000年中國》，1987：177）。

第三部五篇論文分別論述改革開放政策下城市發展多姿多彩的挑戰和突破。董黎明（第9章）闡述和分析城市土地利用的改革與實踐，認為足以影響整體改革開放進路的成敗。自1954年以來，中國土地無償使用，令土地使用嚴重失控，浪費無度。透過改革，中國各級城鎮的土地，已納入有償使用的軌道。在1987年，深圳經濟特區更創新將土地使用權引入市場，將土地有限期地出讓。其後，其他城市和特區均有效法將使用權有償轉讓。但在另一方面，改革正開展，地區與城市間的實施環境和政策差異甚大，存在多種執行上的困難和偏差，結果使國家或城市未能獲取應有的收入，外商和開發公司坐得其利。所以，城市土地改革，方興未艾，有關決策者應汲取雖然仍屬有限的經驗，減少地域間的差異，加強共同可遵循的指

引，釐定一個完善地使用城市土地的新機制。

繼1980年經濟特區建立後，1984年十四座沿海城市被宣布為開放城市，賦予比較特殊和靈活的政策。其中十二座城市均設有經濟技術開發區，作為促進發展的手段之一，在過去數年間，已投資了超過十億元人民幣於基本建設和發展。許自策（第13章）就廣州在黃浦建立的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經驗作評估。開發區於1984年十二月成立，主要目的是引進和開發新技術和新產業。至1990年底已有顯著的成果，引進項目達351個之多，外來投資以香港為首，佔外資總額的60%。到目前，發展困難集中於珠江三角洲近年經濟發展飛快的中、小城市，如佛山、江門、中山、東莞等的劇烈競爭。在開發區內土地、人才均感不足，管理體制仍未完善。管理的不協調，從黃埔港和開發區的獨立性可見一斑，故“港、區一體化”是改善管理的必然步驟。雖然開發區對廣州的經濟發展大有裨益，仍不足以抵消珠江三角洲內近年中、小城镇的冒升。所以，廣州在珠江三角洲經濟的比重已由原來的二分之一下降為四分之一了。展望將來，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確定了走向，充滿信心地開創更好的成績。

在所有受到改革開放直接影響的地區中，發展最突出的莫如珠江三角洲，它之脫穎而出固然有多種原因，但毗鄰香港是其中之一。1980年訂定的國家目標，是在2000年工農產業翻兩番，如今，珠江三角洲已經提前實現。相比之下，其他開放地區發展緩慢。有鑒於此，中央政府於1990年四月決定支持上海醞釀多年的發展黃浦江以東（簡稱浦東），350平方公里地區的計劃。劉君德（第10章）把這個計劃的由來、條件和規劃構想逐一詳述。整個構思是既實際，又大膽，旨在振興上海以至長江三角洲及華中、華北的經濟，與南中國的經濟核心可平分秋色。在九十年代，浦東作為中國開發的重點，已無可

置疑。但發展計劃會由於所需投資額龐大而困難重重，其他開放地區與城市，已因浦東計劃的推展而作出一系列相應的抗衡措施（Yeung and Hu，1992：317-20）。無論如何，浦東發展將會更加積極地推動改革開放，多元化和多層次地尋求更高的經濟效益。

開放政策的構思是逐步的、有層次的。經濟輻射是從點到面、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從外到內、從富到貧。中國很多城市雖不在沿海開放範圍內，但已深受開放改革的正面影響，孕育着新的挑戰。胡兆量（第11章）和崔功豪（第12章）分別介紹和分析新政策對現今首都北京和古都南京的影響。

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重心有南移的趨勢。資金、人才、技術和勞動力紛紛向南轉移，被稱為“孔雀東南飛”。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都是經濟迅速發展的地區，形成南北發展的差距擴大。雖然如此，北京作為一國的首都，亦不斷地快速擴張，引發出管理、運作和基建供求的矛盾，其中嚴重缺水的問題尤其苦惱。北京日益擴大與國家體制和意識形態有分割不開的關係。胡兆量主張把北京的權力適當地分散到其他地區，以舒緩北京目前過分集中的現象和窘境。但真的要下放權力到地區，首要條件是逐漸改變首都第一的觀念。

作為中國四大古都之一的南京，是開發極早，具相當人口規模的城市。惟八十年代以前，南京不是國家投資的重點，故發展緩慢。八十年代以來，它的發展受改革開放鼓舞，突飛猛進，十年之投資量達前三十年的3.7倍。南京經濟已進入了工業化中期的階段，但空間結構仍滯留於工業化初期的格局，它的空間擴張受長江的掣肘。自1984年以來，南京已爭取到多項有利經濟發展的權利，享有較大的自由度，有助於進一步加速發展。九十年代是南京最關鍵的十年，除了重點建設長江以南的多個項目，如地下鐵路的興建和南京機場的擴建改造，整

體發展方面是邁向現代化新型城市和區域核心城市的轉化。

第四部的主題是地區性城市發展趨勢，共五篇論文，以不同地區先後發展的經驗，揭示改革開放所產生的迥異反應和結果。

首先，沈道齊（第14章）展述中國沿海五個經濟和城鎮化發達區域之一的蘇南地區（其他四個是遼中南地區，浙東北地區，珠江三角洲和膠東沿線及膠東地區）的市鎮與區域發展。自八十年代以來，農村經濟改革促進了鄉鎮工業的發展，共一千八百萬家鄉鎮企業在沿海地帶崛起（《信報》，1992年4月24日）。勞動力向非農業部門轉移，小城鎮開始繁榮，邁向小康。鄉鎮企業在蘇南地區的興起有賴上海、蘇州、無錫和常州等城市的扶助。再加上其他特點，如集體經濟為主體，鄉村工業為主導，市場調節為主要手段和縣鄉幹部為實際決策人，因而成為“蘇南模式”（王，1989）。1949年至改革開放實施之時，蘇南地區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相當低，但1984年中央政府鼓勵農民“自理口糧，務工經商”進小城鎮，打開了農民封閉的遷移之門。在一個1987年包括蘇南地區的調查研究中，發現沿海地區小城鎮流動人口達23.2%，以短距離為主，企業工人至少有60%以上來自鎮外（劉等，1990）。總的來說，勞動力轉移的層次相當低，多數是“亦工亦農”，“既未離土，又未離鄉”，“離鄉不離井”等形式，缺少人口遷移的宏觀指導與政策導向。沈道齊將蘇南地區市鎮急速發展下產生的困難提出來討論，也展望下一世紀的前景。

另外一個躋身於發展先鋒地位的是珠江三角洲。許學強（第16章）形容它是培育中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搖籃，1978年便開始改革，採用聯產承包責任制。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把城市化與工業化大力推前。自1984年政府政策允許農村剩餘勞力進入城市後，“暫住”人

口達三百萬之多。“盲流”對城市決策者帶來新的動力和問題，許學強認為它是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表現，是一種自發的遷移，是一種城市化的現象。在整個地區，非農業化勢頭甚勁，從工業產值的跳升便可見一斑。工農業產值比例從1978年的58：42極大幅度地演變為1990年的93：7，足以使人驚訝。1985至1990年間，整個珠江三角洲工業總產值增長了190.8%，而農業總產值也增長40.4%。許多區內的特區，城鎮均以“三資”企業（中外合資，外商獨資，中外合作）和“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料裝配，來樣製作，補償貿易）企業來吸引大量外資投產，產生一般不斷騰升的經濟動力，對城市面貌、經濟轉化和社會秩序，產生了深而且遠的影響。但對於對外開放下的城市化過程，許學強在其他著作（中山大學地理系，1988）提出一些棘手問題，如糧食作物種植面積的減少、棄農經商對農業發展之不良影響、大量人口進城可能擴大城鄉差別、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轉化、城市性用地迅速向外延伸等等。無論如何，珠江三角洲在改革開放下成績斐然，是政策成功的見證，也是其他地區的典範。

第三個地區性發展個案是海南特區。楊葆亨（第18章）把海南特區的自然地理環境、發展因素、發展特點和策略逐一詳述，特別是對海口和三亞兩市到2005年的城市總體規劃作全面的介紹。海南島是中國第二大島，常與台灣相提並論。但是，它們的經濟地位，則相差甚遠。海南島長期作為原料供給地，沒有大型骨幹企業，缺乏政府投資，經濟基礎薄弱，經濟水平低於沿海地區，在全國之中大約處於中下位置。雖然1983年中央政府對海南已定了開放的方針，真正的積極發展只是始於1988年海南建省和建立一個“更大的特區”之後。海南被視為“比現有特區政策還特”的發展地區，繼八十年代的“特區熱”、“沿海熱”，出現“海南熱”，大量人口從大